

LUXUN
YU
KONGZI

鲁迅与孔子

王得后 / 著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

LUXUN
YU
KONGZI

K825.6
L824.32

鲁迅与孔子

王得后 / 著

48

K825.6
L824.35
L824.32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鲁迅与孔子/王得后著. - 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
2009

ISBN 978-7-02-007763-2

I. 鲁… II. 王… III. ①鲁迅(1881~1936)—人物研究
②孔丘(前551~前479)—人物研究 IV. K825.6 B222.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193801 号

责任编辑:王培元

装帧设计:柳 泉

责任印制:李 博

鲁迅与孔子

王得后 著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100705

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425 千字 开本 640×960 毫米 1/16 印张 30.25 插页 2

2010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5000

ISBN 978-7-02-007763-2 定价 39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献 给

草创鲁迅研究室的李何林先生

自序

我为什么编写这本书？

我这一生，自大学毕业，一直在研读鲁迅，从业余到专业，迄今五十二年。“子曰：‘知之者，不如好之者；好之者，不如乐之者。’”（《论语·雍也》）“乐之”而阅读，是人生一大快事。我乐于研读鲁迅。研读鲁迅使我感到充实，感到痛快，感到希望。虽然，当我想写点鲁迅，却又感到没有什么话还要我来说了。

鲁迅是新文化先驱，是终身守护新文化，创造新文化，为扫荡妨害新文化成长的谬见而不遗余力、奋斗不息的一个先驱，又是新文化先驱中最富思想、最有思想业绩的一个。

新文化的滥觞，我认为是陈独秀发表于当年《新青年》的《一九一六年》。因为他提出了对于旧文化的根本挑战。他指出：“儒者三纲之说，为一切道德政治之大原：君为臣纲，则民于君为附属品，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；父为子纲，则子于父为附属品，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；夫为妻纲，则妻于夫为附属品，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。率天下之男女，为臣，为子，为妻，而不见有一独立自主之人者，三纲之说为之也。缘此而生金科玉律之道德名词，——曰忠，曰孝，曰节，——皆非推己及人之主人道德，而为以己属人之奴隶道德也。人间百行，皆以自我为中心，此而丧失，他何足言？奴隶道德者，即丧失此中心，一切操行，悉非义由己起，附属他人以为功

过者也。自负为一九一六年之男女青年,其各奋斗以脱离此附属品之地位,以恢复独立自主之人格!”

“君为臣纲,父为子纲,夫为妻纲”是孔子和他的之徒安身立命的学说精魂,是儒家学说的根基,是“不可得与民变革”的根本特质。这一点,在《礼记·大传》中说得斩钉截铁:“圣人南面而治天下,必自人道始矣。立权度量,考文章,改正朔,易服色,殊徽号,异器械,别衣服,此其所得与民变革者也。其不可得变革者则有矣,亲亲也,尊尊也,长长也,男女有别,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。”亲亲,尊尊,长长,男女有别,是“三纲”的精髓。朝代可以更迭,它是“不可得与民变革”的。正是这“三纲”,自孔子以来两千多年成为我国的“正统思想”——“主流思想”——“统治思想”。挑战儒家的“正统思想”,反对儒家的“正统思想”,是新文化的立意、主旨,也是新文化提出的根据。新文化是对人的奴隶地位提出挑战、坚决反抗的文化,是呼唤人格独立的文化,是争取人成为人的文化。

在中国,现代的人的觉醒,现代的人道的诉求,兴起于晚清。鲁迅并不是最早的。鲁迅是光绪三十三年,公元1907年,二十七岁的时候,在日本作《人之历史》、《科学史教篇》、《文化偏至论》、《摩罗诗力说》和《破恶声论》,才提出了“根柢在人”,“首在立人,人立而后凡事举;若其道术,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”(《文化偏至论》)的“立人”思想,确立了“立人”思想的基础框架。但那时人们追求的是暴力革命,是用武力外抗强权,内革清廷,鲁迅提出的这一思想革命、文化革命,如“叫喊于生人中,而生人并无反应”(《〈呐喊〉自序》)。不合时宜,惟有寂寞。

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皇朝,结束了绵延两千多年的皇权专制制度,建立了民国。但五年过去,“五族共和”的、“民主”的政党政治混乱不堪。陈独秀有鉴于此,作《一九一六年》,一面挑战儒家“正统思想”,一面挑战“政党政治”。风云际会,第二年,1月,胡适在《新青年》发表《文学改良刍议》,2月,陈独秀接着发表《文学革命论》,再一年,鲁迅发表《狂人日记》,对于儒家设计并实行了两千多

年的“家族制度”的弊病，“忧愤深广”地予以暴露。新文化—新文学冲破儒家“正统思想”的牢笼，竞走于神州大地。

还是鲁迅，早在1912年7月，中华民国成立刚过半年，在《哀范君三章》中，就表达了对于政治的失望，他写道：

风雨飘摇日，余怀范爱农。华颠萎寥落，白眼看鸡虫。世味秋茶苦，人闻直道穷。奈何三月别，竟尔失畸躬！

海草国门碧，多年老异乡。狐狸方去穴，桃偶已登场。故里寒云恶，炎天凛夜长。独沈清冷水，能否涤愁肠？

把酒论当世，先生小酒人。大圜犹茗芋，微醉自沈沦。此别成终古，从兹绝绪言。故人云散尽，我亦等轻尘！

“狐狸方去穴，桃偶已登场”，是异常敏锐的政治洞察力。有学者认定新文化的兴起是追求“文化解决问题”，这是没有细心考察新文化的文献，完全不顾新文化先驱者随后的分道扬镳，有的热衷政治、有的组织政党的事实的结论。

鲁迅参与新文化的建设，接续着他青年时期“立人”的思想。1918年4月发表《狂人日记》，暴露儒家的“仁义道德”的根本特质是“吃人”；呼唤“真的人”；呼吁“救救孩子！”7月发表《我之节烈观》，痛批儒家钳制与摧残妇女的“节烈观”。9月发表《随感录二十五》，暴露儒家“父为子纲”，把子女当作“福气的材料，并非将来的‘人’的萌芽”的根本特质，呼唤“因为我们中国所多的是孩子之父；所以以后是只要‘人’之父！”鲁迅和陈独秀一样，首先集中反抗的是儒家的“正统思想”，即儒家的“三纲”。

然而，历史归历史，孔子归孔子，孔子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位伟大的思想家。孔子的伟大，我认为：

一、在他的思想不但传承了两千多年，历遭攻击而不衰败，不断分化而保持着根本特质，显示出惊人的生命力。

二、主要在孔子抓住了人类社会稳定的三个根本问题，即男女问题、父子问题、君臣问题，为此提出了他的处置方法。人类男女

异体,为优化传宗接代,而有夫妇;有夫妇而有子女;人类群居,在家庭之外,进入社会,是各种群体的人际关系,最高即君臣。在君臣这一体系、这一本位之中,是各级“头头”。这三种根本关系如何处理?如何求得稳定?最简单的原则就是一方服从一方,不得有异议,不得有异动。于是乎“君为臣纲,父为子纲,夫为妻纲”被设计出来。这是为强者设计的方案,为权势者设计的方案。弱者一方是被压迫、被钳制、被束缚的一方,是被迫的人身依附,失去了独立的人格、独立的思想的一方。我曾经指出,这是继承动物的法则、森林的法则、“弱肉强食”的法则。但是,在两千多年前,在人类的童年、文明社会的“初级阶段”,是势所必至的。

三、孔子是一个有理想的人,“知其不可而为之”的人,“学而不厌,诲人不倦”的人,在为权势者设计治国的方案之外,对于人生诸多问题提出了一些原则,可供后人借鉴,有可资借鉴的宝贵的思想在。

不过,孔子毕竟是两千五百多年前的古代的人物。他的根本性的思想已严重阻碍中国民族性的现代化。当中国进入20世纪,人的觉醒早已是世界潮流、蔚为大观的时候,我中国人还保守着儒家的“三纲”,让大多数人没有人身自由,没有人格独立,没有思想独立,是无论如何没有道理、没有合法性的了。新文化是顺应世界潮流的产物,是合乎人情、人心、人性的文化。

新文化的诞生,快要一百年、快要一个世纪了。十年前,一股弘扬传统文化的思潮兴起,几乎席卷全中国。新文化被指责为“彻底反传统”,割断文化传统,败坏人心,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;鲁迅是毁灭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罪人。这是完全违背事实、违背新文化根本特质的不实之论。一种呼唤人的觉醒,倡导人道,倡导人格独立、思想自由,寻求“理想的人性”(鲁迅语)的文化,怎么会是灭绝人道、摧毁文化的“大革命”的思想资源呢?

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,一种历史悠久的文化,“传统”是单一的吗?我华夏大地,春秋战国时代,即有“百家争鸣”。到汉武帝,才

强令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，“舆论一律”。即使这样，老子的思想，庄子的思想，法家的思想，时起时伏，并未断绝，难道他们的思想遗产不算传统文化吗？佛教传入中国，经过“汉化”，汉传佛教也历经艰辛，站稳脚跟，得到发展与传承，难道不算传统文化吗？我们土生土长的道教，难道不算传统文化吗？孔子，儒家，不过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端，被统治者钦定为“正统”的一端而已，岂有他哉。“正统”之外必有“异端”；“异端”也是一种传统。把“正统”当作惟一的传统，当作“中华文化的标志”，于事实不合，于理也不安。何况倡导新文化的先驱们，几乎每个人都有自己钟情的传统文化，姑不论陈独秀、胡适、周作人、钱玄同、刘半农，即如最严厉抨击儒家正统，“绝望于孔子和他的之徒”的鲁迅，不是也辑校了大量古籍，搜集了大量石刻拓片，撰写了《中国小说史略》吗？清朝翰林、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挽鲁迅联写着：“著述最谨严，岂徒中国小说史；遗言太沉痛，莫作空头文学家”！难道清朝的翰林，对于“国学”“儒学”，不如当今的教授、学者吗？

更有甚者。遥想当年，在国民党政府的白色恐怖下生活，翻译、创作和辑校古籍的鲁迅，高歌“曾惊秋肃临天下，敢遣春温上笔端”（《亥年残秋偶作》）。而80年代末的一场“风波”，却是“无边落木萧萧下”！少的老的识时务者，纷纷谴责新文化，特别着重谴责鲁迅“激烈”、“激进”、“极左”。一群年轻的俊杰高呼“五四是弑父！我们要弑五四！”要填补五四断裂了的中国传统文化。可惜，他们沉迷于书本，悠然于书房，完全忽视了社会的现实，忘记了文化是人们行为的规范，文化是化人的东西；文化的存在与断绝，要看现实社会人们的思想、行为。挣扎了近一百年的新文化，成功是很有限的，最大、最显著的，是用白话文代替了文言文；儒家的“三纲”，除了在大城市，即使在“首善”之都，也只在一部分人中，实行了一点“男女平等，自由恋爱”之外，我们的农村还在“初级阶段”。即使是“男女平等”，即使在大城市，对于女性的歧视，从被受孕的性别鉴定，“做掉”，到上学歧视，就业歧视，同工不同酬，还多得很。至

于其他,何尝有多少实质性的改变?“必也正名乎”?新词换旧词而已矣!谈什么“断裂”?“弑”什么“新文化”!毁什么鲁迅!

而且,鲁迅是最痛恨专制的一人,最洞察专制的祸害的一人。鲁迅早年即指出:“托言众治,压制乃尤烈于暴君。”(《文化偏至论》)“群众专政”与鲁迅水火不相容。鲁迅历数各种专制的恶果是:

约翰弥耳说: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。我们却天下太平,连冷嘲也没有。我想:暴君的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,愚民的专制使人们变成死相。大家渐渐死下去,而自己反以为卫道有效,这才渐近于正经的活人。(《忽然想到(五至六)》)

约翰穆勒说: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。而他竟不知道共和使人们变成沉默。(《小杂感》)

更何况,鲁迅在回应对他的批判中阐释他的革命观,是:“再则他们,尤其是成仿吾先生,将革命使一般人理解为非常可怕的事,摆着一种极左倾的凶恶的面貌,好似革命一到,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,令人对革命只抱着恐怖。其实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。”(《上海文艺之一瞥》)鲁迅的文化,鲁迅的思想,鲁迅的左翼文学思想,能够导致“文化大革命”吗?谁是中国文化的“民族罪人”?扪心自问吧!

为了检视鲁迅和孔子这两位汉族伟大思想家的思想的根本特质,为了探查“弘扬传统文化”的底细,我决心编写这本书。我之所以敢于以《鲁迅与孔子》为书名,是因为我发现,孔子的伟大,在掌握着人际关系中君臣、父子、夫妇的三个根本关系,在人际关系中定位人的社会地位,规范人的社会生活。孔子的这三种关系,是封闭性的,家长制的,服从性的,抹杀个性、扭曲人性的,甚至于达到“君要臣死不得不死,父要子亡不得不亡”,男的随意三妻四妾,休妻,而女性只能“从一而终”,守寡,乃至殉夫的地步。

而鲁迅的伟大在“立人”,为“立人”掌握着人一要生存并不是

苟活,二要温饱并不是奢侈,三要发展并不是放纵;在以人的每个个体的生存为本位,然后在人际关系中定位人的社会地位、社会生活,发展个性。而且,生存、温饱和发展,是开放性的,有最广阔的自主性的选择空间,独立的,平等的,最切合人性与人情;“不是苟活”,“不是奢侈”,“不是放纵”,在更高的层次追求“幸福的度日,合理的做人”(见《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》),追求“理想的人性”。

正是在人的“生存、温饱、发展”这样三个根本问题上,鲁迅与孔子,有充分的可比性。而且,对于人的这三个根本问题的思考、思想,才是文化的根基;才显示出思想的根本特质。

于是,我斗胆做了。

我为什么这样编写这本书?

第一,我要把资料一一呈现在读者面前,请读者自己阅读原资料,自己思索,自己判断。研究问题不能从原则出发,从预设的结论出发,从自己的好恶出发,只能从事实出发,从资料出发,公开全部资料最有利于和读者交流。

第二,我要请读者看看鲁迅对于人生的根本问题到底说了什么?孔子又说了什么?有比较才能鉴别。“比较是医治受骗的好方子。”(鲁迅《随便翻翻》)

第三,我严重怀疑当今的明星教授大讲特讲的《论语》。我记得鲁迅的意见,他说:“清朝的考据家有人说过,‘明人好刻古书而古书亡’,因为他们妄行校改。我以为这之后,则清人纂修《四库全书》而古书亡,因为他们变乱旧式,删改原文;今人标点古书而古书亡,因为他们乱点一通,佛头着粪:这是古书的水火兵虫以外的三大厄。”(《病后杂谈之余》)我的怀疑是:当今明星教授大讲《论语》而《论语》亡。我要请出四位大家的《论语》译文,和明星教授所讲的来比较比较。

第四,对于我国还有的数目吓人的文盲,我无能为力。虽然,

据说,高中生有所谓“一怕文言文,二怕写作文,三怕周树人”的头痛经,但是,他们被裹胁在“国学”的热潮中,我恳望他们在应试教育中的偷闲时,为清醒自己的头脑,翻翻这本书,看看前辈学者关于《论语》的译文,看看鲁迅关于我们“当务之急”的意见。已经从中学、从大学、从研究生毕业的青年朋友,在谋生的余暇,也翻翻这本书,想想当今之世的社会。毕竟是年轻的一代又一代,肩负着中国的希望。

我的期待

孔子当今在中国的复活,并且不是“乘桴浮于海”,不是只有一个“由”跟随着他,而是乘风破浪,举国护驾,落户世界各国,似乎真的要在彼岸开建“中华文化标志城”的样子了。然而,孔子的核心思想不是“君君臣臣,父父子子”,“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”吗?那个预言 21 世纪是我中华文化的世纪的长者,不是明确坦承“中国文化之定义,具于《白虎通》三纲六纪之说”吗?既然“三纲”是中华文化的“定义”,我期待今天的国学家不要“王顾左右而言他”,而直截了当地阐释这“三纲”的内涵、意义、作用,对谁有利,为什么今天还是治国的宝典,国家的“软实力”?为什么世界各国将会信奉孔子,并改弦易辙实行孔子和他的之徒的“三纲”?

我期待青年朋友,想想孔子和他的之徒的“三纲”,想想鲁迅向青年建议的当下的三个当务之急,冷静地想一想:在当今之世,什么是可以信奉的?什么对于我们自己的生存和成长有益、有利?

我期待读者给我指教和批评。凡是有以教我者,我都感激,不胜感激之至。

王 得 后

2009 年 8 月 5 日 星期三

目 录

鲁迅与孔子对“生死”问题的思考	001
鲁迅与孔子对“温饱”问题的思考	069
鲁迅与孔子对“父(母)子(女)·血统”问题的思考	151
鲁迅与孔子对“妇女问题”的思考	231
鲁迅与孔子对“发展”问题的思考	283
鲁迅所引用与加点评的《论语》	325
鲁迅与孔子的根本分歧	410
鲁迅为什么“绝望于孔夫子和他的之徒”	436
鲁迅为什么反对“中庸”	457
后记	469
主要引用书目	471

鲁迅与孔子对“生死”问题的思考

上

一 孔子说“生死”

(一)“生”——生命

季路问事鬼神。子曰：“未能事人，焉能事鬼？”曰：“敢问死。”曰：“未知生，焉知死？”（《论语·先进》）

杨伯峻译文：“子路问服事鬼神的方法。孔子道：‘活人还不能服事，怎么能去服事死人？’子路又道：‘我大胆地请问死是怎么回事。’孔子道：‘生的道理还没弄明白，怎么能够懂得死？’”（《论语译注》第113页）王按：“问事鬼神”，不仅是问“方法”，语义可包括“态度”、“看法”。译为“侍奉鬼神的事”似更妥帖。“未”，不等于“不”；还有“没”的意思。如“未雨绸缪”、“未亡人”中的“未”不能译为“不”；“未能”和“不能”有区别。这里最好译为“没能侍奉人，怎能侍奉鬼”。

子曰：“非其鬼而祭之，谄也。见义不为，无勇也。”（《论语·为政》）

李泽厚译文：“孔子说，‘不是自己家族的鬼而去祭祀，这是谄媚。遇见正义的事情而不做，这是无勇气。’”（《论语今读》第74页）

祭如在，祭神如神在。子曰：“吾不与祭，如不祭。”（《论语·八佾》）

北京大学哲学系 1970 级工农兵学员译文：“祭祀祖先就象祖先真在面前，祭神就象神真在面前。孔子说：‘我如果不亲自参加祭祀，那和不祭是一样的。’”（《〈论语〉批注》第 54 页）

司马牛忧曰：“人皆有兄弟，我独亡！”子夏曰：“商闻之矣，死生有命，富贵在天。君子敬而无失，与人恭而有礼。四海之内皆兄弟也，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？”（《论语·颜渊》）

北京大学哲学系 1970 级工农兵学员译文：“司马牛忧愁地说：‘别人都有兄弟，唯独我没有。’子夏说：‘我听说过：‘死生有命，富贵在天。’君子（只要做事情）严肃认真而不出差错，对人恭敬而合乎周礼。那么，天下的人都是自己的兄弟了。君子何愁没有兄弟呢？’”（《〈论语〉批注》第 257 页）

王按：“君子敬而无失”，多家译文均指做事，惟李泽厚译为“做一个君子，严谨而不放纵”（《论语今读》第 281 页）。这是以怎样律己与待人来翻译这句话；而多家以做事与待人来翻译这句话。生活中，一个人律己其实就是待人，待人也就是律己，是相辅相成、一个硬币的两面。而“敬而无失”，不仅仅限于“做事”，待人也就在“做事”之中。“敬而无失”是从负面说，不违背礼数；“恭而有礼”是从正面说，要有礼数。似以不切割更妥帖。

（二）“生”——活着

孟懿子问孝。子曰：“无违。”樊迟御。子告之曰：“孟孙问孝于我，我对曰，无违。”樊迟曰：“何谓也？”子曰：“生，事之以礼；死，葬之以礼，祭之以礼。”（《论语·为政》）

李泽厚译文：“孟懿子问如何是孝？孔子回答说，‘不要违背。’樊迟替孔子赶车，孔子对他说，‘孟懿子问我如何是孝，我回答说不要违背。’樊迟问道：‘这是什么意思？’孔子说，‘父母亲活着，按照礼制来事奉；死了，按照礼制来安葬，按照礼制来祭祀。’”（《论语今读》第 54 页）

子张问崇德辨惑。子曰：“主忠信，徙义，崇德也。爱之欲其

生，恶之欲其死。既欲其生，又欲其死，是惑也。‘诚不以富，亦祇以异。’”(《论语·颜渊》)

杨伯峻译文：“子张问如何去提高品德，辨别迷惑。孔子道：‘以忠诚信实为主，唯义是从，这就可以提高品德。爱一个人，希望他长寿；厌恶起来，恨不得他马上死去。既要他长寿，又要他短命，这便是迷惑。这样，的确对自己毫无好处，只是使人奇怪罢了。’”(《论语译注》第127页)

王按：杨先生有“注释”说：“诚不以富，亦祇以异——《诗经·小雅·我行其野篇》诗句，引在这里，很难解释。程颐说是‘错简’（别章的文句，因为书页次序错了，误在此处），但无证据。我这里姑且依朱熹《集注》的解释而意译之。”（《论语译注》第127—128页）钱穆保留“诚不以富，亦祇以异”而未翻译。李泽厚引钱穆见解，干脆将它从这一段删去。北京大学哲学系1970级工农兵学员译文为“（正如《诗》所说的：）‘即使不是嫌贫爱富，也是喜新厌旧。’”

陈子禽谓子贡曰：“子为恭也，仲尼岂贤于子乎？”子贡曰：“君子一言以为知，一言以为不知，言不可不慎也！夫子之不可及也，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。夫子之得邦家者，所谓立之斯立，道之斯行，绥之斯来，动之斯和。其生也荣，其死也哀，如之何其可及也？”（《论语·子张》）

北京大学哲学系1970级工农兵学员译文：“陈子禽对子贡说：‘你对仲尼太恭敬了吧，难道他真比你强吗？’子贡说：‘君子说一句话可以表现出他的聪明，说一句话也可以表现出他的不聪明，所以说话不可不慎重。我的老师是无人能比得上的，就象天不能搭着梯子爬上去一样。我的老师如治理一个国家，他要老百姓立于礼，老百姓就会立于礼；要引导老百姓，老百姓就会跟着走；要安抚老百姓，老百姓就会归顺；要发动老百姓，老百姓就会同心协力。老师他活着十分荣耀，老师死了令人十分悲哀。我怎么能赶得上老师呢？’”（《论语批注》第438页）

王按：“子为恭也”句，多家均指子贡对孔子的态度，钱穆甚至

说是：“言子故为恭敬以尊让于师”（《论语新解》第500页）。惟李泽厚译为“你太谦虚了”，似更妥帖。盖“子为恭也”不一定专指对待孔子也。

子曰：“志士仁人，无求生以害仁，有杀身以成仁。”（《论语·卫灵公》）

李泽厚译文：“孔子说，‘志士仁人不苟全性命而损害仁，宁肯牺牲生命来完成仁。’”（《论语今读》第359页）

（三）死——不轻死

子谓颜渊曰：“用之则行，舍之则藏，惟我与尔有是乎！”子路曰：“子行三军，则谁与？”子曰：“暴虎馮河，死而无悔者，吾不与也。必也临事而惧，好谋而成者也。”（《论语·述而》）

北京大学哲学系1970级工农兵学员译文：“孔子对颜渊说：‘用我，我就去干，不用我，我就隐藏起来，惟独我和你能够做到这样吧！’子路问孔子说：‘如果你统帅三军，那么你和谁在一起呢？’孔子说：‘空手和虎搏斗，蹚水过河，死了都不后悔的人，我不和他在一起。必须是遇事小心谨慎，善于谋划而能完成任务的人（才行）。’”（《〈论语〉批注》第145页）

王按：“临事而惧”句，多家均指出有“恐惧”意；“小心谨慎”不足以表达遇事“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”的恐惧态度。杨伯峻译为“恐惧谨慎”，李泽厚译为“谨慎恐惧”，更加妥帖。

子畏于匡，颜渊后。子曰：“吾以女为死矣！”曰：“子在，回何敢死！”（《论语·先进》）

钱穆译文：“先生在匡被围，颜渊落在后。先生说：‘我当你已死了。’颜渊说：‘先生尚在，回哪敢轻易去死呀！’”（《论语新解》第295页）

子贡曰：“管仲非仁者与？桓公杀公子纠，不能死，又相之。”子曰：“管仲相桓公，霸诸侯，一匡天下，民到于今受其赐。微管仲，吾其被发左衽矣。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，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